

孝道：理论、测量、变迁及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傅绪荣 汪凤炎 陈 翔 魏新东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摘要 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为对象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组合。近 10 余年来孝道研究领域在理论建构、测量工具的开发、孝道变迁研究以及其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建构孝道多元模型，不断完善孝道测量工具，采用系统化思维、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改进研究质量，更加关注孝道与积极心理变量的关系。

关键词 孝道；孝道测量；孝道变迁；孝道双元模型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极重要地位(杨国枢, 叶光辉, 黄丽莉, 1989)，我国学者一向重视对孝道(filial piety)的研究。但孝道以往一直是历史学、文献学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心理学从 20 世纪 70 年代才开始涉足(张坤, 张文新, 2005)。经过 40 余年发展，心理学研究者对孝道的定义及内涵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为对象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组合，包括认知(孝知)、情感(孝感)、意志(孝意)和行为(孝行)四个方面(杨国枢等, 1989; 汪凤炎, 郑红, 2013, pp.255–256)。孝道内涵主要包括敬爱双亲、顺从双亲、谏亲以理、事亲以礼等 15 项内容(杨国枢等, 1989)。张坤和张文新曾对 2005 以前的孝道研究成果进行过梳理和总结。不过，由于中国现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提倡孝道既看到了家庭在养老中的不可替代性，也有利于减轻政府养老负担。因此近 10 余年来孝道研究迅速升温，在 4 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孝道理论研究的突破。早期孝道研究主要基于杨国枢等人(1989)的理论分析。叶光辉(2009a)对其进一步提炼，并结合以

往实证研究成果建立了孝道双元模型，近年来该模型在研究中不断完善和成熟。(2)聚集孝道变迁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孝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这引起众多学者的密切关注(Lee & Hong-Kin, 2005; 范丰慧, 汪宏, 黄希庭, 史慧颖, 夏凌翔, 2009; 刘汶蓉, 2012; Xie & Zhu, 2009; Luo & Zhan, 2012; 汪凤炎, 许智豪, 孙月姣, 周玲, 2014; 李晓彤, 王雪玲, 王大华, 燕磊, 2014; 曹惟纯, 叶光辉, 2014)。那么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有必要在整理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回答该问题。(3)编制出新的孝道问卷。孝道变迁导致传统孝道测量工具无法满足当前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结合时代背景编制了一些新的孝道问卷(Wang, Laidlaw, Power, & Shen, 2009; Lum et al., 2015; Yeh & Bedford, 2003)。(4)考察了孝道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如孝道与青少年学业成就和学业动机的关系(Chow & Chu, 2007; Chen & Ho, 2012; Chen & Wong, 2014; Hui, Sun, Chow, & Chu, 2011)、孝道与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关系(Kuo & Liu, 2012; Liu, 2013; Pan, Gauvain, & Schwartz, 2013; Yeh, 2004)、孝道与个体幸福感和个体适应性的关系(Cheng & Chan, 2006; 金灿灿, 邹泓, 余益兵, 2011; 陆洛, 高旭繁, 陈芬忆, 2006; Leung, Wong, Wong, & Chang, 2010)、孝道与人际关系的关系(Wong, Leung, & Chang, 2010; Yeh & Bedford, 2004; Li, Zou, Liu, & Zhou, 2014; 金灿灿等, 2011; 李启明,

收稿日期: 2015-04-27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2 年度重大项目(12JJD880012)和江苏“2011 计划”·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 汪凤炎, E-mail: fywangjx8069@163.com

陈志霞, 2013)以及预测孝道行为的因素(Cheah, Özdemir, & Leung, 2012; 黄士哲, 叶光辉, 2013; 李启明, 徐海燕, 2011; 金灿灿等, 2011)等。本文试图从孝道理论、测量、变迁及其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等方面系统总结近 10 年来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在孝道研究上所取得的新进展, 并展望未来研究走势。

2 双元孝道模型

根据叶光辉(2009a)的论述以及从双元孝道模型的发展脉络来看, 其理论构思主要来自于三方面研究:(1)叶光辉(2009a)回顾中国历史后发现中国人的孝道主要有两个层面: 文化和心理。文化层面指孝道是对宜农生态环境的适应策略; 心理层面指孝道是亲子自然情感互动的结果。(2)以往研究多视孝道为单一结构(Ho, 1994), 研究结论不一致, 如有的研究认为孝道具有积极效应, 而其他研究发现孝道具有消极效应。具有积极效应的研究将孝道界定为情感连接与相互支持的亲密互动, 而具有消极效应的研究多将孝道界定为权威和强制规则(Yeh & Bedford, 2003; 叶光辉, 2009a)。(3)杨国枢等人(1989)通过对传统经典文本的分析发现孝道的 15 项内涵, 并以此编制孝道问卷, 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了传统孝道的四因素结构: 尊亲恩亲、抑己顺亲、奉养祭念和护亲荣亲。后来叶光辉(2009b)用因素分析进一步将四因素聚合为两个更高阶因素结构。

叶光辉等人(Yeh & Bedford, 2003)以上述三方面研究为基础, 建构出双元孝道模型, 将“亲子情感”和“家庭角色规范”视为两个维度, 并进行排列组合, 从理论上讲, 便可得到 4 个孝道子类型: 高情感性+高权威性、高情感性+低权威性、低情感性+高权威性、低情感性+低权威性(如图 1 所示)。由此可见, “孝道双元模型”实质是“孝道双维模型”。

不过, 在实证研究中, 叶光辉主要测量了其中的相互性孝道(高情感性+低权威性)和权威性孝道(低情感性+高权威性), 故将之称作“孝道双元模型”。其中, 相互性孝道依据“报”原则和“亲亲”原则运作, 偏重于“亲子情感”, 包括“尊亲恩亲”和“奉养祭念”两方面, 研究结论多表明此维度具有积极效应; 权威性孝道依据“尊尊”原则运作, 偏重于“家庭角色规范”, 包括“抑己顺亲”和“护亲荣亲”两方面, 研究结论多表明此维度具有消极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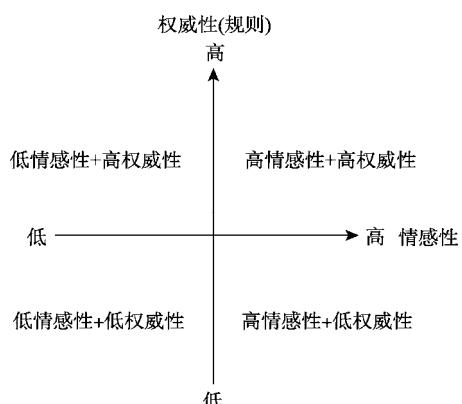


图 1 孝道双维模型示意图

应(叶光辉, 2009a)。相互性孝道基本不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属于核心孝道观念; 权威性孝道受文化形塑, 不同时代的孝道规范通过内化过程受个体认同, 属于变迁孝道观念(叶光辉, 2009a)。

经 10 多年发展, 孝道双元模型现已较为成熟, 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也主要采用此模型及在其基础上编制的问卷, 显示该模型在孝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是, 针对这一模型的批评也存在, 如, 维度命名与其包含内容之间不完全相容或模糊不清(黄光国, 2009; 利翠珊, 2009; 伊庆春, 2009; 杨中芳, 2009), 该理论只说明测量工具包括两类孝道, 而不能说现实中只存在这两类孝道(利翠珊, 2009)。顺便指出, 在孝道研究早期也出现过与双元孝道模型类似的理论模型。如 Sung (1995)从开放式问卷调查中获得了 11 个孝道条目, 再加上另外的两个条目构成 13 个变量, 38 个题项的 5 点李克特式孝道问卷, 经因子分析后发现韩国人的孝道为两因素结构: 行为取向的孝道(Behaviorally-Oriented Filial Piety), 包括牺牲、责任和偿还等 3 个方面; 情感取向的孝道(Emotionally-Oriented Filial Piety), 包括家庭和谐、爱或情感、尊敬等 3 个方面。可以看出, 叶光辉等人提出的双元孝道模型与此模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权威性孝道与行为取向的孝道相似, 两者都强调对权威和强制规范的遵从; 相互性孝道与情感取向的孝道相似, 两者都强调基于情感联结的相互支持。可惜, 这一“双元模型”在当代孝道研究中没有产生广泛影响。

3 编制孝道新问卷

孝道研究早期已开发出不少孝道问卷(杨国

枢等, 1989; Ho, 1994; Sung, 1995)。由于孝道发生变迁, 现有研究或将上述问卷修订后再使用(Chen & Ho, 2012; 吴超, 秦启文, 李亚娟, 2008; 汪凤炎等, 2014; 张坤, 张文新, 2004), 或重新编制孝道问卷(Wang et al., 2009; Lum et al., 2015; Yeh & Bedford, 2003)。下面重点介绍近年来出现的3个较有代表性的孝道新问卷。

3.1 双元孝道问卷

Yeh 和 Bedford (2003)基于双元孝道模型, 编制出双元孝道问卷(Dual Filial Piety Scale, 简称 DFPS), 题项取自杨国枢等(1989)编制的孝道问卷, 分为长短两个版本(长版16题, 每个维度8题; 短版9题), 由尊亲恩亲、奉养祭念、抑己顺亲和护亲荣亲四个一阶因子构成, 聚合为相互性和权威性孝道两个二阶因子。短版DFPS的拟合指标(GFI = 0.972、AGFI = 0.942、NFI = 0.860、NNFI = 0.811、CFI = 0.884)(叶光辉, 2009b)以及内部一致性系数(相互性孝道为0.90, 权威性孝道为0.79)(Yeh & Bedford, 2003)都有良好表现。长版DFPS的拟合指标(SRMR = 0.03, NNFI = 0.98, RMSEA = 0.07), 两因子的相关($r = 0.46$)以及内部一致性系数(相互性孝道为0.91, 权威性孝道为0.87)均符合测量学要求(Yeh, 2004)。由于DFPS具有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优良的测量学指标, 因而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孝道问卷。

3.2 孝道期望问卷

现在所使用的孝道问卷大多测量子女所持的孝道信念和表现出的孝道行为, 少有问卷测量父母对子女的孝道期望。Wang等人(2010)在实践中发现了孝道期望的二元结构: 期望(expectation)和非期望(non-expectation), 进而编制了孝道期望量表(filial piety expectation scale, 简称FPE), 对以往研究作了重要补充。该问卷的施测对象为年龄在53到88岁的495名中国内地老年人。问卷共包括13个题项, 采用5级计分, 1表示非常不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问卷包括两个维度: 期望维度($\alpha = 0.84$, 9题, 如“子女应该坚信照顾父母是他们的责任”), 非期望($\alpha = 0.65$, 4题, 如“父母不希望子女照顾自己, 只有子女过上幸福生活, 父母才会高兴”)。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NFI、RFI、CFI、IFI、TLI均在0.9以上, RMESA为0.80。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并未给出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能解释的问卷总变异量。总体看来, 该问卷有一定理

论基础, 并且所列出的各项指标均符合测量学要求, 因此可以在后续研究中使用。但需指出的是, 该问卷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如非期望维度的题项较少, 造成该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

3.3 当代孝道问卷

Lum等(2015)鉴于传统孝道的权威服从内涵在现代社会已经淡化, 编制了当代孝道问卷(Contemporary Filial Piety Scale, 简称CFPS)。CFPS施测对象为1080名中国香港人, 年龄18~97岁, 平均年龄52.7岁。问卷共10题, 采5级计分, 2个因子: 实用性义务(Pragmatic obligations) ($\alpha = 0.86$, 6题, 如“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和同情性尊重(Compassionate reverence) ($\alpha = 0.79$, 4题, 如“你会尽力达成父母对你的期望”), 共解释总变异的60.09%。CFPS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8, 拟合指标CFI = 0.95。可见, CFPS的各项测量指标均有较好表现。不过, 该问卷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的问题。并且, 该问卷的测量指标仅在香港人中得到了检验, 未来仍需进一步在其他地区和文化群体中检验其信效度。

3.4 小结

虽然目前出现了3个孝道新问卷, 不过, 除了双元孝道问卷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应用较广外(Yeh & Bedford, 2003), 其余两个孝道新问卷存在3个不足:(1)理论基础较薄弱, 因为多是根据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形成问卷的结构维度, 属数据驱动型。(2)问卷的信效度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问卷使用率较低, 导致问卷的信效度在使用中得不到检验和提升。从根本上说, 现有问卷之所以不太完美, 主要是因为缺乏扎实的理论基础研究, 因此, 未来应该重在孝道的理论建构, 并基于理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编制孝道问卷。

4 聚集孝道的变迁

孝道是否会伴随现代化而消解或是弱化, 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当代孝道开始衰落(陈柏峰, 2007; Cheung & Kwan, 2009; 李伟华, 2014; 李晓彤等, 2014; Wang et al., 2010), 另一些研究却不支持这一结论(杜鹏, 曲嘉瑶, 2013; Huang & Chu, 2012; Jou & Chu, 2012; 刘汶蓉, 2012; Yeh, Yi, Tsao, & Wan, 2013)。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1)现有研究分别在中国内地和中

国港台地区进行,港台和内地现代化历程和政治经济的差异(Yeh et al., 2013),可能造成人们对传统孝文化认同程度的差异。(2)中国内地较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也易造成研究结论的不一致。(3)研究方法不同。孝道衰落的结论多得自于一些外在客观指标(Cheung & Kwan, 2009; Wang et al., 2010)或个案观察(陈柏峰, 2007; 李华伟, 2014),而不支持孝道衰落的结论多依据人们对孝道观念的认同度,前者更关注“行”,后者更关注“知”,对孝道认同度高不意味着尽孝行为也会高,结构性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尽孝行为而造成知行不一(Zhan & Montgomery, 2003)。(4)未对孝道内涵做区分。孝道内涵中包含异化的内容和反映人类自然情感的内容(叶光辉, 2009a),研究发现前者更被人认同,后者则不然(曹惟纯, 叶光辉, 2014; 汪凤炎等, 2014; 叶光辉, 2009a; Yeh et al., 2013; 张坤, 张文新, 2004),笼统考察孝道变迁很容易造成混淆并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若将孝道认知和孝道行为分开探讨则更易看到真相。

4.1 认知层面孝道的变迁

认知层面的孝道主要考察人们对孝道信念的认同状况,属于“知”的层面。现有研究大多依据经典文本的相关论述制成问卷,考察人们对孝道信念的认同情况。

从表1可知:(1)研究对象既包括中国内地被

表1 认知层面的孝道变迁

研究者及时间	被认同的孝道	不被认同或认同度减弱的孝道	测量工具	被试来源
叶光辉(2009b)	亲自奔丧、感念亲恩、尊敬双亲,奉养双亲,荣耀护亲,陪侍在侧	传宗接代,抑己顺亲	改编杨国枢等人(1989)《孝道行为量表》	中国台湾(20~64岁)
吴超等(2008)	关心精神感受,平时多相处交流,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做出成绩,光宗耀祖	一定要生男孩;继承父志,就算违背自己的意愿;送父母去养老院	参考Ho(1996)的孝道问卷自编	中国内地五城市的大学生
范丰慧等(2009)	养亲尊亲	丧葬祭念、顺亲延亲	自编问卷	中国内地被试(年龄构成不详)
Yeh等(2013)	相互性孝道	权威性孝道	DFPS(9题)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20~69)
汪凤炎等(2014)	尊敬父母,关心父母,经常带爱人、子女回老家看望父母	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由父母安排婚事;厚葬去世的父母,并守孝三年	修订自黄坚厚(1996)的孝问卷	南京市(19~60)
李晓彤等(2014)	奉养祭念	抑己顺亲,尊亲恩亲,护亲荣亲	杨国枢等(1989)《孝道认知量表》	广州,石家庄(18~40)
曹惟纯,叶光辉(2014)	相互性孝道的受重视程度明显增强,已经成为当代台湾民众孝道观的核心	权威性孝道的受重视程度弱化;权威性孝道受重视程度有所上升,但是仍然没有相互性孝道受重视	DFPS(9题)	中国台湾(19~72)

试也包括中国港台被试,但所得结论相似,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港台与内地经历相似的孝道变迁过程。(2)传统孝道变迁不是简单的消解与否,而是部分内涵仍受高度认同,其他部分的认同度开始下降。具体来说,认同度降低的传统孝道主要有:传宗接代、压抑自己顺从父母、绝对服从父母意志、父母在不远游、厚葬去世父母、为了尽孝不惜伤害自己等。认同度仍较高的传统孝道主要有:赡养父母、尊重父母、情感慰藉、荣耀父母、不愿把父母送养老院等。(3)主要考察孝道认同,属于认知层面的孝道,而它与实际的孝道行为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落差(Lam, 2006; Zhan & Montgomery, 2003)。

4.2 行为层面孝道的变迁

行为层面孝道主要考察人们根据传统孝道信念而实际表现出来的孝道行为,属于“行”的层面。

首先,老人与子女同住趋势逐渐减弱。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是传统孝道的重要内容(叶光辉, 2009b),但现有研究发现同住趋势开始减弱(Lee & Hong-Kin, 2005; 刘岚, 雷蕾, 陈功, 2014; 曲嘉瑶, 杜鹏, 2014)。在中国内地农村地区,大量农村青壮年到城市务工,实际上导致了农村老人居住方式的空巢化与隔代化(孙鹃娟, 2010; 王萍, 左冬梅, 2007)。但值得欣慰的是,有研究表明子女外出务工没有降低老人对子女孝顺的评价(Luo &

Zhan, 2012)。同时,由于工作等原因致使子女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照顾父母,子女往往会把父母送养老院(Zhan, Feng, & Luo, 2008)。选择养老院养老的子女往往会调整其孝道观念,认为送父母去养老院并为此支付费用是孝的表现(Zhan et al., 2008)或是进行补偿,如经常探望父母等(李琬予,寇彧,李贞,2014;Zhan et al., 2008),进而协调传统孝道和当前孝道标准之间的矛盾。不过,从现有研究来看,居住安排的变化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老人对子女孝顺评价的研究则较少见。

其次,老人从子女处所获各种支持有降低趋势。传统孝道要求子女为年老父母提供经济、情感和身体照料等支持(Ho, 1994)。目前的研究发现,伴随社会变迁,老人从子女处所获得的经济支持(丁志宏, 2013)、家庭照料与情感慰藉(孙鹃娟, 2010; 闫志民等, 2014)都开始减少。

最后,女儿尽孝行为主体地位的提升。传统孝道认为尽孝主要由儿子承担(Zhan & Montgomery, 2003),现有研究发现女儿在尽孝行为中的作用大为提升,包括经济或物质支持(丁志宏, 2013; 唐灿, 马春华, 石金群, 2009; 刘汶蓉, 2012; Xie & Zhu, 2009)、生活照料(刘汶蓉, 2012)和情感支持(Lee & Hong-Kin, 2005; 刘汶蓉, 2012; Shi, 2009; 唐灿等, 2009)等,并且,女儿也被父母评为更为亲近或有孝心(Cheng & Chan, 2006; Luo & Zhan, 2012),女性自评尽孝程度也高于男性(汪凤炎等, 2014)。Shi (2009)认为女儿尽孝行为主体地位上升的原因主要有:(1)对代际关系的重新解释导致父母权威下降;(2)妇女在婚姻中的权力上升;(3)老人情感需要上升,而女性在情感支持上具有天然优势。

5 孝道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近10多年,孝道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继续受到重视,下面主要从“孝道对相关心理和行为的预测”和“预测孝道行为的因素”两个方面总结近些年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5.1 孝道对相关心理与行为的预测

孝道是影响华人心理与行为的重要文化心理变量,故大量研究关注孝道对华人心理与行为的预测和作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5.1.1 孝道对青少年学业动机和学业成就的预测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学生往往在学业成就上表现更为突出(Hui et al., 2011)。为了寻找其中

原因,文化因素受到重视(Chen & Wong, 2014)。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特别重视家庭观念,那么家庭因素势必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和学业动机产生较大影响。与家庭有关的众多因素中,孝道自古以来受到人们的提倡(杨国枢等, 1989),子女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后,会努力寻求回报。加之中国父母比较关注子女的学业成就,因此可以预见子女对孝道越认同,就越可能在学业上努力进取,进而获得好成绩。实证研究确实支持这一推断,如 Chow 和 Chu (2007)采用 Ho (1994)编制的孝道问卷调查了中国香港中学生,结果发现孝道与学业动机的微弱正相关,并且孝道中的自我牺牲维度对学业动机的影响最为显著。Hui 等(2011)也采用 Ho (1994)编制的孝道问卷调查中国香港中学生,同样发现孝道与学业成就的微弱正相关。由于 Ho (1994)编制的孝道问卷为单一结构,更关注孝道的权威内涵,而叶光辉等人(Yeh & Bedford, 2003)基于双元孝道模型编制的孝道问卷不仅包含了孝道的权威内容,也包含了情感内容,那么这两个问卷的研究结果是否相同呢?Chen 和 Ho (2012)使用双元孝道问卷(长版)调查了中国台湾大一新生,结果发现子女感知到父母对自己付出后,会更加努力学习,但这仅限于那些持有相互性孝道的学生,持有权威性孝道的学生由于不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而不能内化父母的教育价值观,也就没有表现出学业成就的增长。由此可见,孝道的不同内涵对子女的学业动机和学业成就影响不一样,这也部分解释了 Chow 和 Chu (2007)以及 Hui 等(2011)只发现了孝道与学业动机的微弱正相关。

除此之外,为了弄清楚孝道通过哪些路径影响了学业成就,一些研究者还考察了孝道影响学业成就的中介机制。如 Chen 和 Wong (2014)使用双元孝道问卷(短版)调查了中国香港大学生,结果发现相互性孝道通过正向影响学生的能力增长观而提高学业成就;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学生的能力实体观而降低学生的学业成就。Chen 和 Ho (2012)发现孝道通过学业信念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Hui 等(2011)发现孝道通过自我决定理论中的3个成分(胜任力、自主性和关系)的中介作用于学业动机。可见,孝道影响学业成就和动机的中介因素比较多,未来还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

总之,将孝道视为单一结构的研究(Chow &

Chu, 2007; Hui et al., 2011), 发现孝道对学业成就动机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但影响不大; 将孝道视为双元结构(Chen & Ho, 2012; Chen & Wong, 2014), 却发现相互性孝道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影响, 而权威性孝道对学业成就没有影响, 甚至产生负面影响。虽然上述研究采用的因变量不同, 但鉴于学业动机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密切关系, 仍然可以从中窥探出双元孝道模型在探讨孝道与学业成就之间关系中发挥更大优势。

5.1.2 孝道对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预测

自主性反映了人们对独立性以及与他人分离开来的渴望。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性是所有人类共同的基本需要, 这也被跨文化研究所证实。自主性也是青少年的重要发展任务, 但孝道要求子女顺从父母, 这与自主性的发展可能存在冲突, 进而可能抑制自主性的发展。因此孝道与自主性发展的问题自然成为研究焦点之一。Hui 等(2011)发现孝道与自主性动机正相关, 这似乎说明孝道与自主性发展不存在冲突, 相反两者可以相互促进。不过, 这一研究将孝道和自主性视为单一结构, 还不能提供更为丰富的结论。

目前更多的研究将自主性分为个体自主性(individuating autonomy)和关系自主性(relating autonomy), 考察两种自主性与孝道的关系。拥有个体自主性的人强调独立性自我认同(independent self-identity), 不仅经历了与父母的分离, 而且在反省和自我决定时, 更关注自己与他人的独特性, 并与他人保持清晰的界限; 而拥有关系自主性的个体强调互依性自我认同(interdependent self-identity), 更看重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反省和自我决定时, 更关注自我和他人的和谐关系; 相比于西方人, 中国人更可能同时具有两种自主性(Yeh, 2014)。孝道与两种自主性的关系是不同的。由于相互性孝道关注亲子之间的积极情感交流, 来自父母的支持和爱, 可能促进子女深刻的自我反省, 并自己做决定, 从而有利于子女个体自主性和关系自主性的发展; 而权威性孝道更关注权威服从和等级关系, 子女在做决定时会更多的考虑人际关系的影响, 导致关系自主性的发展, 抑制个体自主性的发展。Yeh (2014)使用双元孝道问卷(长版)调查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自主性发展和孝道的关系, 结果证实了这样的猜测, 并且这一结果在 Kuo 和 Liu (2012)和 Liu (2013)的研究也有体现。

现有研究大多在中国港台地区进行, 内地情况如何呢? 目前还很少见到从子女的孝道信念角度考察其对子女自主性影响的研究, 但从父母对子女的孝道期望角度研究其对子女自主性的影响略有所见。如 Pan 等(2013)从杨国枢等人(1989)的孝道行为量表中节选一部分作为研究工具, 考察中国内地父母对子女的孝道期望与子女自主性动机的关系, 结果发现, 如果父母期望子女尊敬和照顾父母, 那么该种孝道期望可以通过自主授权(autonomy granting)的中介正向作用于子女自主性动机; 如果父母期望子女保护和支持父母荣誉, 那么该种孝道期望会通过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负向作用于子女自主性动机。

总之, 目前来看虽然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不同, 给结果的比较造成困难, 但是这些研究均发现孝道的不同内涵对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影响和中介机制不同(Pan et al., 2013; Yeh, 2014)。李琬予和寇彧(2011)曾从双元孝道模型的角度对自主性和孝道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总结: 个体化自主性和权威性孝道彼此抑制, 而关系自主性与相互性孝道彼此促进。不过, 值得强调的是,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在中国港台地区获得, 内地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 未来有必要加强。

5.1.3 孝道对个体幸福感和个体适应性的预测

孝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已有几千年时间。现有研究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孝道的核心内涵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范丰慧等, 2009; 汪凤炎等, 2014; 陆洛等, 2006; Yeh et al., 2013)。既然孝道对中国人有如此深刻的影响, 那么在目前倡导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大背景下, 孝道对人们的适应性和幸福感的影响到底如何, 这自然成为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之一。

陆洛等(2006)认为华人比较重视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如果父母和子女拥有相近的孝道观则有利于双方的互动, 推动良好关系的形成, 进而对个体幸福感产生影响。他们采用庄耀嘉等(1991)编制传统孝道问卷和自编的新孝道问卷考察了孝道对中国台湾子女和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发现子女和父母孝道观念确实会对子女自身的幸福感造成影响, 但是父母的幸福感则只受到子女孝道观念的影响, 而不受父母自身孝道观念的影响。除了陆洛等(2006)的研究关注了父母的视角, Cheng 和 Chan (2006)的研究

则完全从父母的角度，考察父母感知到的子女的孝道行为对自身幸福感的影响。在控制了健康状况和经济压力因素之后，子女的孝道行为能够显著预测父母的幸福感，其中尊重因子是父母幸福感的最重要预测因素。

有些研究则在双元孝道模型的框架下考察孝道对幸福感的影响。如 Chen (2014)采用双元孝道问卷(长版)调查中国香港大学生孝道信念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发现相互性孝道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而权威性孝道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Leung 等(2010)采用双元孝道问卷(长版)调查了中国香港青少年孝道与心理社会适应(psychosocial adjustment)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了青少年的年龄、学习成绩和感知的父母温暖(perceived parental warmth)后，相互性孝道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能力(social competence)正相关；权威性孝道与青少年的自尊和社会能力负相关。

总之，孝道对个体幸福感和个体适应性会产生影响，从双元孝道模型的角度来看，不同孝道内涵对幸福感和适应性的影响不同：相互性孝道对个体幸福感和适应性具有积极影响，而权威性孝道对这些变量则具有消极影响。不过，目前考察孝道与幸福感和适应性关系的研究还很欠缺，尤其是孝道影响幸福感和适应性的中介和调节机制问题几乎还没有涉及，未来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5.1.4 孝道对人际关系的预测

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孝道作为家庭系统的核心，指导着子女如何对待父母，因此孝道影响着亲子关系(Wong et al., 2010)。在孝道规范的影响下，子女会尽量顺从父母的意愿，特别是在“父慈子孝”的对等性孝道下，子女感到的父母为自己付出了辛劳，自己有义务回报。因此，孝道可能有利于改善亲子关系，减少亲子冲突。Yeh 和 Bedford (2004)使用双元孝道问卷(短版)调查中国台湾中学生，发现两种孝道都能降低亲子冲突，但相互性孝道比权威性孝道更能降低亲子冲突。与此研究有细微差异，Li 等(2014)采用双元孝道问卷(短版)调查了中国内地青少年，发现相互性孝道显著减少亲子冲突发生的频率，但权威性孝道对亲子冲突频率减小的作用不显著。Wong 等人(2010)考察了孝道在母亲控制影响母子关系质量中的调节

作用，结果发现青少年越是持有较强的孝道观念，母亲控制对母子关系质量的积极影响就越明显。

孝道是指导亲子关系的规范，原本只局限在亲子关系研究中。不过，在儒家典籍里，孝道也要求对父母以外的人表示尊重，这说明孝道有向家庭之外扩展的可能(金灿灿等, 2011; 李启明, 陈志霞, 2013)，历史上出现的“泛孝主义”就是明证。由此可以推断，对孝道认同度高的人不仅有良好的亲子关系，而且可能将对孝道的认同“迁移”到其他人际关系中，改善个体与他人的人际关系状况，不过根据双元孝道模型，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在相互性孝道中发生。现有研究确实证实了这点，如金灿灿等(2011)发现互惠性孝道与亲社会倾向呈显著正相关，与人际疏离呈显著负相关。李启明和陈志霞(2013)发现权威性孝道和相互性孝道正向影响个体对社会上老年人的普遍认知及行为方式，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这必然有助于改善个体与年长者的关系。不过，目前孝道对除亲子关系以外的其他人际关系影响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5.2 预测孝道行为的因素

由于亲子关系调节着孝道信念的形成和发展(李琬予, 寇彧, 2011)，因此大量研究从亲子关系角度探讨孝道行为的预测因素。

感知到父母为自己付出以及对父母的积极情感预测孝道行为。Cheah 等(2012)的研究发现子女感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越多，那么子女就越容易体会到父母对自己的支持和温暖态度，从而激发青少年做出更多的孝道行为；与此类似，基于孝道基础上形成的对父母的积极感情也会增加子女对父母的温暖和支持的感知，进而影响子女对父母的孝道行为。

父母教养方式对孝道形成的预测及其机制。黄士哲和叶光辉(2013)将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教养方式和民主型教养方式，认为前者易形成亲子之间积极情感联系，后者易造成亲子之间的感情疏远，预示着父母教养方式与双元孝道的联系。他们的研究发现父亲的权威教养方式通过情境性顺从的中介影响权威主义孝道；父亲的民主教养方式通过承诺性顺从的中介影响权威性孝道；而母亲的民主教养方式通过承诺性顺从的中介影响权威性孝道；父亲的民主教养方式通过感激的中介影响相互性孝道；母亲的民主教养方式通过感激的中介影响相互性孝道。李启明和陈志霞(2013)

则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控制性教养方式和关爱式教养方式，考察其与孝道形成的关系，结果发现父母关爱性教养方式促进相互性孝道的形成，父母控制性教养方式使子女形成权威性孝道。

父母教养行为对孝道形成的预测及其机制。李晓彤等(2014)使用杨国枢等人(1989)编制的孝道问卷考察父母教养行为对孝道的影响，结果发现尊亲恩亲、奉养祭念和护亲荣亲与父母的温暖教养行为正相关，与父母的拒绝负相关；抑己顺亲与父母温暖以及父亲的过度保护正相关；母亲的温暖正向预测、母亲的拒绝负向预测子女的尊亲恩亲、奉养祭念和护亲荣亲；母亲的过度保护正向预测子女的奉养祭念，父亲的温暖和过度保护行为越多，子女更可能抑己顺亲。

还有研究考察了亲子依恋对孝道形成的影响。如金灿灿等(2011)发现具有较好父子和母子依恋质量的青少年，亲子互动良好而顺畅，更有可能基于亲情和回报父母养育之恩产生互惠性孝道信念。

尽管亲子关系对孝道的预测更为重要，但也不可忽视更为宏观的因素对孝道的影响。如李启明和徐海燕(2011)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杨国枢等人提出的心理传统性和心理现代性概念，考察其对双元孝道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心理现代性通过影响特质移情进而促使互惠性孝道的形成，而心理传统性通过影响权威主义人格进而促使权威性孝道的形成。

综上所论，目前研究者更多关注家庭因素对子女孝道形成的影响，却相对忽视宏观层面，如历史文化等因素对孝道形成的影响，这是未来需要加强研究的方面。

5.3 小结

从现有孝道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看，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发现：(1)现有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青少年，对成人群体关注相对不够，特别是中年子女。中年子女是赡养老人的主体人群(李琬予等，2014)，他们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况，承受着更大的孝道压力。中年人的孝道直接影响了其对父母的赡养行为，那么影响中年子女孝道认知和行为的因素有哪些？是否与青少年有所不同？孝道对中年子女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作用及其机制等问题都非常值得关注。(2)从父母的角度考察孝道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可能与孝道

的定义有关，当前关于孝道的定义主要采用杨国枢等人(1989)的观点，此定义侧重从子女角度看孝道。不过，考察父母的孝道期望也非常重要，如 Wang 等(2009)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孝道期望与自身的自尊和从子女处获得支持成正相关。(3)从生态系统论的观点看，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包含从微观到宏观等多个层面，具体到孝道研究中也是如此。首先，目前孝道对相关心理和行为预测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个体方面，对孝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人和社会的发展则较少探讨。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已有研究开始关注这个方面(金灿灿等，2011；李启明，陈志霞，2013)，这预示着孝道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其次，目前探讨哪些因素可以预测孝道行为也主要局限于亲子关系、个体因素等微观层面，对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关注较少。从这个角度看，有研究者(李启明，徐海燕，2011)从心理现代性和心理传统性这样的历史文化因素考察其对孝道形成的影响就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6 总结与展望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孝道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也存在某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们构成未来孝道研究的新动向：

首先，宜建构孝道多元模型。鉴于孝道表现有多样性，涉及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已有研究大多只从单一学科、单一视角进行考察，很难全面揭示孝道的实质及其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同时，现有关于孝道的心理学研究要么无自己独到的理论架构，要么是以孝道双元模型为依据。孝道双元模型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亲子情感”有善恶之分，故只从数量上将“亲子情感”作高低之分，不易让人看到“亲子情感”的善恶维度，进而不易让人区分孝道的真伪。就孝道而言，凡是其中蕴含着真情的，都是真孝道；反之，凡是带有虚情假意的孝道，都是伪孝道。同时，个体在践行孝道规则时，与其作权威性的高低之分，不如依其遵守规则的自觉程度高低作他律与自律区分更佳。再者，根据子女践行孝道时自身、他人及社会正当权益增损的程度大小，孝道中的确有合理与悖理之分，这也可作为区分孝道的一个维度。这样，未来孝道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宜是：

将孝文化分为孝心理文化、孝制度文化和孝行为文化三个方面，并综合考虑真——伪、他律——自律、合理——悖理三个维度(汪凤炎, 郑红, 2013, pp.257-258)，由此便可以建构出一个虽更加复杂、却更接近真实情形的三维孝道模型，或叫孝道三维模型(如图2所示)，方能深入、全面地揭示孝道的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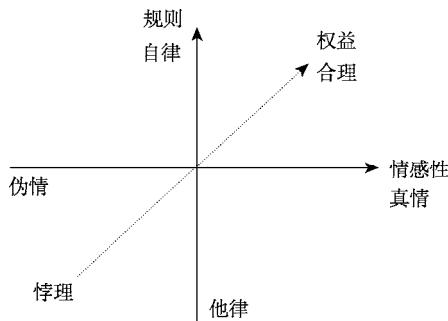


图2 孝道三维模型示意图

其次，宜不断完善孝道测量工具。社会变迁导致孝道内涵的变化，早期孝道测量工具难以满足当前研究需要，研究者一般会对其进行修订后再使用(金灿灿等, 2011; 吴超等, 2008; 汪凤炎等, 2014)，但修订后的问卷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相关测量学指标不高等问题。目前新开发的测量工具(Lum et al., 2015)，除个别问卷有较扎实理论基础外，大部分问卷仍缺乏厚实理论支撑，且其信效度和跨文化的一致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因此，未来孝道研究要想得到更丰富的结论，宜以孝道三维模型为理论依据，开发出信效度良好的测量工具，以满足实证研究需要。

再次，宜采用系统化思维、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改进研究质量。已有多数研究或是纯粹的文本分析和理论分析，或是单纯的问卷研究和田野研究，前者往往缺少分析的深度，后者通过道德两难故事访谈、问卷调查所获数据便于量化、统计方便，但被试回答受到道德两难故事访谈、问卷或量表的限制，不能穷尽被试对所调查问题的真实、全面的回答。并且，一些研究由于方法不同、测量工具不同、取样不同，导致某些研究结论有看似矛盾之处。例如，有问卷研究表明，自1982年以来中国人总体上对孝道持很高的认同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汪凤炎等, 2014)。但也有田野研究表明：儒家伦理尤其是孝道在豫西李村已崩

解(李华伟, 2014)。由此就引出两个问题：问卷调查所获“总体上当代中国人对孝道持很高的认同态度”的结论，是因为被试主要是在城市取样，而从总体上看，较之村民，市民有更佳的经济基础、受过更好的教育，从而更易认同和践行孝道吗？孝道在豫西李村崩解仅是个案吗？要解决这类看似矛盾的问题，就须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理论分析法、问卷法、纵向研究和实验法，并寻找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才有可能准确把握社会转型背景下孝文化的变迁规律。同时，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城乡二元结构又导致城乡居民在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再者，由于年龄、性别、价值观、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的影响，老人中年人和青少年儿童、男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眼中的孝道及对待孝道的态度与行为肯定也有一定差异。这样，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在做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纵向研究和孝道教育实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样本地区间的平衡性与不同群组之间样本的代表性。

最后，宜更加关注孝道的积极效应及其与一些积极心理变量的关系。有学者将孝道定义为子女以父母为对象的良好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组合(杨国枢等, 1989)，该定义强调了“良好”一词，说明未发生异化的孝道是一种积极心理品质或积极人格特质，这一定义与当前强调研究人类积极心理的大背景相暗合。古人将“孝”视为百善之首(百善孝为先)，并指出“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虽然有将孝道作用无限夸大的嫌疑，但也不能说古人的看法完全没有道理。孝道具有积极的心理效应，如有研究表明，孝道对父母和子女的幸福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Cheng & Chan, 2006; 陆洛等, 2006)，孝道对老人的自尊具有积极影响(Wang et al., 2009)。这都表明将孝道视为人类的积极心理特质并考察其与其他积极心理品质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未来孝道研究应该关注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 陈柏峰. (2007). 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皖北李圩村调查.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4, 106–113.
- 曹惟纯, 叶光辉. (2014). 高龄化下的代际关系——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1994-2011). *社会学研究*, (2),

- 116–144.
- 丁志宏. (2013). 中国老年人经济生活来源变化: 2005–2010. *人口学刊*, 35, 69–77.
- 杜鹏, 曲嘉瑶. (2013). 中国老年人对子女孝顺评价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 37, 30–41.
- 范丰慧, 汪宏, 黄希庭, 史慧颖, 夏凌翔. (2009). 当代中国人的孝道认知结构. *心理科学*, 32, 751–754.
- 黄光国. (2009). 从“儒家关系主义”评“华人孝道双元模型”. *本土心理学研究*, 32, 163–185.
- 黄坚厚. (1996). 现代生活中的“孝”的实践. 见杨国枢(主编), *中国人的心理* (pp. 20–32).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黄士哲, 叶光辉. (2013).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双元孝道信念的影响效果: 中介历程的探讨. *本土心理学研究*, 119–164.
- 金灿灿, 邹泓, 余益兵. (2011). 中学生孝道信念的特点及其与亲子依恋和人际适应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6), 619–624.
- 利翠珊. (2009). 孝道的俗世意义和多重面向. *本土心理学研究*, 32, 199–205.
- 李华伟. (2014). 儒家孝道伦理借基督教重生?——乡村基督徒激活与改变儒家伦理的悖论性个案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1, 107–117.
- 李启明, 徐海燕. (2011). 大学生心理传统性及现代性、人格特质与双元孝道的关系. *心理学探新*, 31, 539–543.
- 李启明, 陈志霞. (2013). 父母教养方式与双元孝道、普遍尊老的关系. *心理科学*, 36(1), 128–133.
- 李琬予, 寇彧. (2011). 孝道信念的形成与发展: 不同文化下亲子互动的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19(7), 1069–1075.
- 李琬予, 寇彧, 李贞. (2014). 城市中年子女赡养的孝道行为标准与观念. *社会学研究*, (3), 216–246.
- 李晓彤, 王雪玲, 王大华, 燕磊. (2014). 青年子女的传统孝观念及其与早期父母教养行为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 601–608.
- 刘岚, 雷蕾, 陈功. (2014). 北京市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趋势. *北京社会科学*, (5), 79–84.
- 刘汶蓉. (2012). 孝道衰落?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青年研究*, (2), 22–32.
- 陆洛, 高旭繁, 陈芬忆. (2006). 传统性、现代性、及孝道观念对幸福感的影响: 一项亲子对偶设计. *本土心理学研究*, 25, 243–278.
- 曲嘉瑶, 杜鹏. (2014). 中国城镇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对空巢居住的影响. *人口与发展*, 20, 87–94.
- 孙鹃娟. (2010).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人口学刊*, (1), 28–33.
- 唐灿, 马春华, 石金群. (2009). 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社会学研究*, (6), 18–36.
- 汪凤炎, 郑红. (2013). *中国文化心理学(增订本)*.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汪凤炎, 许智豪, 孙月娇, 周玲. (2014). 中国人孝道心理的现状与变迁. *心理学探新*, 34, 529–535.
- 吴超, 秦启文, 李亚娟. (2008). 对当代大学生孝道观的调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青年价值观变迁研究. *青年探索*, (1), 40–43.
- 王萍, 左冬梅. (2007).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 (6), 28–38.
- 叶光辉. (2009a). 华人孝道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本土心理学研究*, 32, 101–148.
- 叶光辉. (2009b). 台湾民众之孝道观念的变迁情形. 见叶光辉, 杨国枢 (主编), *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 (pp. 104–133).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杨中芳. (2009). 试论深化研究孝道的方向. *本土心理学研究*, 32, 149–161.
- 杨国枢, 叶光辉, 黄丽莉. (1989). 孝道的社会态度与行为: 理论与测量.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 (台北), 171–227.
- 伊庆春. (2009). 回应“华人孝道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本土心理学研究*, 32, 187–197.
- 闫志民, 李丹, 赵宇晗, 余林, 杨逊, 朱水容, 王平. (2014). 日益孤独的中国老年人: 一项横断历史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2, 1084–1091.
- 庄耀嘉, 杨国枢. (1991). 传统孝道的变迁与实践: 一项社会心理学之探讨. 见杨国枢 (主编),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 张坤, 张文新. (2004). 青少年对传统孝道的态度研究. *心理科学*, 27(6), 1317–1321.
- 张坤, 张文新. (2005). 孝道的心理学研究现状. *心理学探新*, 25, 19–22.
- Cheah, C. S. L., Özdemir, S. B., & Leung, C. Y. Y. (2012). Predicting the filial behaviors of Chinese–Malaysian adolescents from perceived parental investments, filial emotions, and parental warmth and suppor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5, 628–637.
- Chen, S. X., Ho, B. M., & Tang, D. H. (2007). Decomposing filial piety into filial attitudes and filial enactmen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0, 213–223.
- Chen, W. W., & Ho, H. Z. (2012).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roles of Taiwanese students' academic beliefs and filial p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 315–324.
- Chen, W. W.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filial pie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8, 308–314.
- Chen, W. W., & Wong, Y. L. (2014). What my parents make me believe in learning: The role of filial piety in Hong Ko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 249–256.
- Cheng, S. T., & Chan, A. C. M. (2006). 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well older Chines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61, P262–P269.

- Cheung, C. K., & Kwan, A. Y. H. (2009). The erosion of filial piety by modernisation in Chinese cities. *Ageing and Society*, 29, 179–198.
- Chow, S. S. Y., & Chu, M. H. T. (2007). The impact of filial piety and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motivation in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sian Journal of Counseling*, 14, 91–124.
- Ho, D. F. Y. (1994). Filial piety, authoritarian moralism, and cognitive conservat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0, 349–365.
- Ho, D. Y. F. (1996). Filial pie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In M. H. Bond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L. L., & Chu, R. L. (2012). Is it the wind shearing or the tide going in and out? Searching for core values and its changing trend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Kaohsiung Behavior Sciences*, 3, 60–90.
- Hui, E. K. P., Sun, R. C. F., Chow, S. S. Y., & Chu, H. T. (2011). Explaining Chinese students' academic motivation: Filial piety and self-determina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1, 377–392.
- Jou, Y. H., & Chu, R. L. (2012). The social change and determinant of the values of Taiwan people. In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Taiwan.
- Kuo, C. S., & Liu, Y. L. (2012, January). Filial piety as a moderator betwee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d adolescent autonomy in Taiwa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47, pp. 251–251). England: Psychology Press.
- Lam, R. C. (2006).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the actual performance: A study of the caregiving roles of the modern sandwich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7, 299–313.
- Lee, W. K. M., & Hong-Kin, K. (2005). Differences in expect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formal support for older persons in Hong Kong: Modification to filial piety. *Ageing International*, 30, 188–206.
- Leung, A. N. M., Wong, S. S. F., Wong, I. W. Y., & Chang, C. M. (2010). Filial piety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Hong Kong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0, 651–667.
- Li, X. W., Zou, H., Liu, Y., & Zhou, Q. (2014). The relationships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nd filial piety to adolescents' family functioning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3, 29–38.
- Liu, Y. L. (2013). Autonomy, filial piety, and parental authority: A two-year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74, 557–581.
- Lum, T. Y. S., Yan, E. C. W., Ho, A. H. Y., Shum, M. H. Y., Wong, G. H. Y., Lau, M. M. Y., & Wang, J. F. (2015).
- Measuring filial p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10-Item contemporary filial piety scale.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3, 1–13.
- Luo, B. Z., & Zhan, H. Y. (2012). Filial piety and functional support: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mong families with migrate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geing International*, 37, 69–92.
- Pan, Y. Q., Gauvain, M., & Schwartz, S. J. (2013). Do parents' collectivistic tendency and attitudes toward filial piety facilitate autonomous motivation among young Chinese adolescent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7, 701–711.
- Shi, L. H. (2009). "Little Quilted Vests to Warm Parents' Hearts": Redefining the gendered practice of filial piety in rural North-easter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8, 348–363.
- Sung, K. T. (1995). Measures and dimensions of filial piety in Korea. *The Gerontologist*, 35(2), 240–247.
- Wang, D. H., Laidlaw, K., Power, M. J., & Shen, J. L. (2009). Older people's belief of filial piety in China: Expectation and non-expectation. *Clinical Gerontologist*, 33(1), 21–38.
- Wong, S. M., Leung, A. N. M., & Chang, C. M. (2010). Adolescent filial piety as a moderator between perceived maternal control and mother-adolescent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Hong Kong. *Social Development*, 19, 187–201.
- Xie, Y., & Zhu, H. Y. (2009). 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1, 174–186.
- Yeh, K. H., & Bedford, O. (2003).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 215–228.
- Yeh, K. H., & Bedford, O. (2004). Filial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9(2), 132–144.
- Yeh, K. H. (2004). Filial piety an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 D. L. Poston, Jr., W. S. Yang, & C. R. L. Chu (Eds.), *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Kluwer/Plenum Publisher.
- Yeh, K. H., & Yi, C. C., Tsao, W. C., & Wan, P. S. (2013). Filial p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8, 277–296.
- Yeh, K. H. (2014). Filial Piety an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in the Taiwanese Family. In *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ies* (pp. 29–38). Springer Netherlands.
- Zhan, H. J., & Montgomery, R. J. V. (2003). Gender and elder care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filial piety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Gender and Society*, 17, 209–229.
- Zhan, H. J., Feng, X. T., & Luo, B. Z. (2008). Placing elderly parents in institutions in Urban China: A Reinterpretation of Filial Piety. *Research on Aging*, 30, 543–571.

Filial piety: Theories, measurements, variations, and relationships to related variables

FU Xurong; WANG Fengyan; CHEN Xiang; WEI Xindong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Filial Piety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hat children have towards their parents. In recent years,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fields of filial piety, including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exploitation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application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to estimate and measure the variations of filial piety and also its relation to other variables. The key to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s to establish multiple filial piety models, improvement of filial piety measuring tools, enhancement of research quality by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research methods and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Key words: filial piety; measurement of filial piety; the variations of filial piety; Dual Filial Piety Model